

大學叢書

中國文學批評史

下冊之二

郭紹虞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大學叢書
中國文學批評史

下冊之二

郭紹虞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第四篇 清代（上——文論）

第一章 清初之風氣

第一節 錢謙益

錢謙益字受之，號牧齋，江蘇常熟人。所著有初學集一百十卷，有學集五十卷，有學集補遺二卷，投筆集一卷。事見清史稿四百八十九卷。他是明末清初文壇的領袖，與吳偉業、龔鼎孳號稱江左三大家，而錢氏於批評方面尤多獨特的見解，所以他的影響較吳龔二人爲尤鉅。不過後人以其爲貳臣傳中的人物，不免加以輕視，而初學有學二集亦於乾隆時被禁燬板。所以他在文學史或文學批評史上的地位，每因其出處之關係而動搖。

實則，我們假使不以人廢言，則他的思想言論也與清代學術文藝有一些關係。清代學風重在實事求是，而他於李貫之先生存餘稿序謂『世降道衰，教學偏背，煩蕪之章句，熟爛之時文，剽賊傭積之俗學，耳食目論，浸淫薰習，而先民辨志敬業之遺法不可以復考矣。』（有學集十八）清學風氣又在以復古爲解放，而他於從遊集序謂『自儒林道學之術分歧於儒家而古學一變，自江門姚江之學側出於經術而古學再變，』（有學集二十）這簡直又

是顧亭林所謂經學卽理學的主張了。然而人家論到清學的開山大師，總推顧亭林黃梨洲，而不及牧齋，豈不因爲他是貳臣的緣故嗎？豈不因爲他僅僅是文人的緣故嗎？

文人之轉移文風興學者之改變學風，實在也有相互的關係。其賴古堂文選序中說得好：

近代之文章，河決魚爛，敗壞而不可救者，凡以百年以來，學問之繆種，浸淫於世運，熏結於人心，襲習綸輪，醞釀發作，以至於此極也。蓋經學之繆三：一曰解經之繆，以臆見考詩書，以杜撰竄三傳，鑿空警說，則會稽季氏本爲之魁。二曰亂經之繆，石經托之賈逵，詩傳假諸子貢，矯誣亂真，則四明豐氏坊爲之魁。三曰侮經之繆，詞虞書爲俳偶，摘雅頌爲重複，非聖無法，則餘姚孫氏鑛爲之魁。史學之繆三：一曰讀史之繆，目學耳食，踵溫陵卓吾之論斷，而漫無折衷者是也。二曰集史之繆，攘遺拾瀋，防毗陵荆川之集錄，而茫無鉤貫者是也。三曰作史之繆，不立長編，不起凡例，不諳典要，腐於南城（皇甫書），蕪於南潯（大政記），踳駁於晉江（名山藏），以至於盲瞽僭亂，螻聲而蚋鳴者皆是也。說文長箋行而字學繆，幾何原本行而曆學繆，冬瓜瓠子之禪行而禪學繆。凡此諸繆，其病在膏肓湊理，而癥結傳變，咸著見於文章。（有學集十七）

則知錢氏雖是文人，而其論學主張所以與顧黃相同者，卽以此故了。顧黃爲學風而反抗明學，其關係是直接的；錢氏爲文風而反抗明學，其關係是間接的。直接的易明，間接的當然不易爲人稱道了。然而無論如何，不能說清代學風與他絕不生關係。

明白他爲學宗旨是如此則本於這種論學的見解以論文當然不滿意於李王一流之剽竊模擬，當然更不滿意於鍾譚一派之新奇偏仄。他答徐巨源書謂：『竊嘗謂末學之失，其病有二：一則蔽於俗學，一則誤於自是。』（有學集三十八）由文而言，李王之失有些近於俗學，鍾譚之失，又是誤於自是。所以他於贈別方子玄進士序中說：弘治中，學者以司馬杜氏爲宗，以不讀唐後書相誇詡爲能事。夫司馬杜氏之學固有從來，不溯其所從來，而驕語司馬杜氏，唐以後豈遂無司馬杜氏哉？務華絕根，數典而忘其祖，彼之所謂復古者，蓋亦與俗學相上下而已。

馴至於今，人自爲學，家自爲師，以鄙俚爲平易，以杜撰爲新奇，如見鬼物，如聽鳥語，無論古學不可得見，且并其俗學而失之矣。

前一節說的是李王，後一節說的是鍾譚，總之，其弊病都在於束書不觀。鍾譚誤於自是，師心自用，且不成爲俗學。李王知所宗主，而不溯源流，數典忘祖，故步自封，所以又有類於俗學。他於答唐訓導汝謬論文書中說得更痛快：

本朝自有本朝之文，而今取其似漢而非者，爲本朝之文；本朝自有本朝之詩，而今取其似唐而非者，爲本朝之詩。人盡蔽錮其心思，廢黜其耳目，而唯繆學之是師！在前人猶做漢唐之衣冠，在今人遂奉李王爲宗祖，承譌踵僞，莫知底止。僕嘗論之，南宋以來之俗學，如塵羹塗飯，稍知滋味者，皆能唾而棄之。弘正以後之繆學，如僞玉賈鼎，非博古識眞者，未有不襲而寶之者也。繆學之行，惑世而亂眞，使夫人窮老盡氣，至死而不知悔，其

爲禍尤慘於俗學（初學集七十九）

這是很嚴厲很痛快的攻擊。牧齋所謂俗學，原指科舉之文。所以俗學之流弊人所易知。至以復古爲號召之繆學，則其流弊便難以覺察。即因俗學不能亂真，而繆學能之。繆學能夠亂真，而繆學之空疏不學，卻復與俗學相類。同樣是塵羹塗飯，而卻盛以精緻的器皿，喊着冠冕的口號，故其誤人也益甚。『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這惟繆學能之而俗學不能，所以牧齋之攻擊繆學，也更甚於俗學。牧齋早年對於空同弁山二集也是瀾翻背誦，可以暗中摸索的。（見有學集三十九，答山陰徐伯調書）他即是過來人，所以他深知繆學之毒。

七子倡言復古，而適成其謬，竟陵知七子之繆，而欲救其弊，然而學彌惛而識彌下，更鑽入牛角尖裏去了。舍正路而不由，這是牧齋對於竟陵派所深致惋惜的。其嘉定四君集序云：

古學之湮廢久矣。向者剽賊竄竊之病，人皆知訾笑之。而學者之冥趨倒行，則愈變而愈下。譬諸懲塗車芻靈之僞，而遂真爲罔兩鬼魅也。（初學集三十二）

當時受竟陵影響者，如王思任，如文翔鳳，都有這種弊病。錢牧齋說得好：『使世之山川，有詭特而無平遠，不復成其爲造物；使人之居室，有突奧而無堂寢，不復成其爲人世。又使世之覽山水造居室者，舍名山大川不游而必於詭特，則必將梯神山，航海市，終之於鬼國而已；舍高堂邃宇弗居而必於突奧，則必將巢木杪，營窟室，終之於鼠穴而已。』（初學集三十一，劉司空詩集序）所以鍾譚之說用以救李王之弊則有餘；假使奉爲文學之正宗，則又有商量的

上所論述，只是說明牧齋思想之消極的方面。現在，再述牧齋文論之淵源所自，以見其積極的主張。他答山陰徐伯調書云：『與練川諸宿素遊，得聞歸熙甫之緒言，與近代剽賊顧質之病。』（有學集三十九）這是他轉變之始。所謂練川諸宿素者，即是「嘉定四先生」——唐時升、字叔達、婁堅、字子柔、程嘉燧、字孟陽、李流芳、字長蘅。他們猶能守其師說，講誦於荒江寂寞之濱，而牧齋都與之交游。這是他受影響最大的一點，所以他再與震川之孫昌世，訪求震川遺集重加刊定。（見初學集八十三，題歸太僕文集）此外，對於唐荆川也相當推崇。他少時，熱爛空同龔州諸集，他的父親便說，『此毗陵唐應德所云三歲孩作老人語耳。』（見初學集四十九，宋玉叔文集題辭）這是他少時對於唐荆川的認識。後來他於常熟縣教諭武進白君遺愛記一文即推尊荆川之學。（見初學集四十三）所以牧齋之攻擊李王，而知古學之源流，可說是受歸唐的影響。

又牧齋與「公安派」也頗為接近。他與袁小修遊，而中郎友人如湯養仍董玄宰及「公安」末流陶仲璞諸人，牧齋也都受其影響。

其答山陰徐伯調書云：『臨川湯若士寄語相商曰：本朝勿漫視宋景濂，於是始覃精研思，刻意學唐宋古文，因以及金元元裕之虞伯生諸家，少得知古學所從來，與爲文之阡陌次第。』又題宋玉叔文集云：『客從臨川來，湯若士寄聲相勉曰：本朝自空同已降，皆文之興臺也，古文自有真，且從宋金華着眼。自是而指歸大定。』則是他的傾向。

古學，除歸震川外，又很受湯臨川的影響。湯臨川晚年有志於其鄉先正曾王之學，並且以其所未及成就者勸牧齋。這與公安派的主張雖已稍異其趣，然而牧齋之訾訾王李，無疑的也受臨川的影響。由這一點言，他們的目標都是相同的。

牧齋於陶仲璞遜園集序中更有對公安派極公允的評論。

萬曆之季，海內皆詆訾王李，以樂天子瞻爲宗。其說唱於公安袁氏。而袁氏中郎小修皆李卓吾之徒，其指實自卓吾發之。……夫詩至於香山，文至於眉山，天下之能事盡矣。袁氏之學未能盡香山眉山，而其挾撻蕪穢，開滌海內之心眼，則功於斯文爲大。（初學集三十一）

他雖說袁氏之學，未能盡香山眉山，然而以香山眉山爲宗，則也是牧齋所贊同的。謂香山眉山盡天下詩文之能事，則也是牧齋所承認的。

我們於此，可以看出牧齋思想的來源。

明白牧齋思想之來源，然後可以知道他論文的積極主張，正與清初學者亭林梨洲一流人相同。所不同者，顧黃重在學術上的成就，而牧齋則用以建立其文學批評的主張而已。

牧齋於其答山陰徐伯調書早已說過：『僕以孤生謏聞，建立通經汲古之說，以排擊俗學，海內驚噪，以爲希有，而不知其郵傳古昔，非敢創獲以譁世也。』（有學集三十九）「通經汲古」四字，是他文論的中心思想，是他文

論的基本觀念。這全與清初學者同其主張。在這裏，我們所要注意的，乃是他如何應用此觀念以建立其文學批評。於是，請讀他的復李叔則書：

夫文章者，天地變化之所爲也。天地變化與人心之精華交相擊發，而文章之變，不可勝窮。文至於昌黎止矣！陸希聲言李元賓與退之所得不同，不可以相上下；叔則謂唐宋之文不盡於八家，此知其變者也。是故論唐文於韓柳之前，未嘗無陳拾遺、許曲江也；未嘗無權禮部、李員外、李補闕、孤常州、梁補闕也；未嘗無顏魯公、元容州也；元和以還與韓柳挾轂而起者，指不可勝屈也。宋初廬陵未出，未嘗無楊億、王禹偁也；未嘗無穆脩、柳開也；廬陵之時，未嘗無石介、尹洙、石曼卿也；眉山之時，未嘗無二劉、三孔也；眉山之學流入於金源而有元好問；昌黎之學流入於蒙古而有姚燧；蓋至是文章之變極矣。天地之大也，古今之遠也，文心如此其深，文海如此其廣也。竊竊然戴一二人爲巨子，仰而曰李何，俛而曰鍾譚，乘車而入鼠穴，不亦愚而可笑乎？（有學

集三十九

在這篇文中，他很明白地說出勸人開拓心胸，勸人擴大眼界，勸人兼收並蓄，以多師爲師。所以他在鄭孔肩文集序中說明「近代之僞爲古文者，其病有三：曰儻，曰剽，曰奴。」（初學集三十二）何謂儻？如「簞人子，賃居廊廡，主人翁之廣廈華屋，皆若其所有，問其所托處，求一茅蓋頭，曾不可得。」何謂剽？如「椎埋之黨，銖兩之奸，夜動而晝伏，忘衣食之源而昧生理，韓子謂降而不能者類是。」何謂奴？如「傭其耳目，囚其心志，呻呼噏嚔，一不自主，仰他人之鼻

息，而承其餘氣」者是。這全是對於明代文人空疎的反抗，所以要以「通經汲古」四字起其沈痼。杜甫詩云：「別裁僞體親風雅，」又云：「轉益多師是汝師。」錢氏論文，庶幾同此主張。

我們明白了他的積極主張，然後可以進窺牧齋之文章定義，以看出他整個的論文主張。現在除上文所舉復李叔則書中所言而外，再舉幾條他對於文章所下的定義。

文章者天地英淑之氣，與人之靈心結習而成者也。（初學集三十一，李君實恬致堂集序）

根於志，溢於言，經之以經史，緯之以規矩，而文章之能事備矣。（有學集十九，周孝逸文稿序）

根據這些話，可以知道他所謂文章，是一方面重在性靈，一方面重在學問。這雙管齊下的文章定義，可以說是對於七子竟陵之補救，同時也可以說是集歸唐公安之大成。

性靈與學問，如何可以雙方兼顧呢？他使用一「真」字以聯貫之。性靈求其真，學問求其真，於是雙管齊下，可以一以貫之了。其復李叔則書一文，頗說明真與僞的分別。

文章途轍，千途萬方，符印古今，浩劫不變者，惟真與僞二者而已矣。僞體滋多，稂莠煩殖，有以獵兔園拾餽飣爲經術者矣，有以開馬肆陳芻狗爲理學者矣，有以拾斷爛黨枯朽爲史筆者矣，有以造木鳶祈土龍爲經濟者矣。真文必淡，而陳羹醢酒酸薄腐敗者亦曰淡。真文必質，而盤木焦桐卷曲枯朽者亦曰質。真文必簡，而斷絲折線尺幅窘窄者亦曰簡。真文必平，而涔蹄牛踪，行潦紆餘者亦曰平。真文必變，而飛頭歧尾，乳目臍口者

亦曰變。眞則朝日夕月；僞則朝華夕槿也。眞則精金美玉，僞則瓦礫糞土也。不待比量而區以別矣。（有學集）

· 三十九 ·

根據他這一篇文所說的眞字，便可知道不僅李王諸人贗古之文其弊在於僞，即竟陵派也未嘗不是僞。假使再進一步的說，即摹倣歸唐者也不能離於僞；即公安派也未能完全做到一個「眞」字。這個關係，即因各人對於「眞」之認識不相同的緣故。

牧齋於湯養仍先生文集序又申其義云：

古之人往矣，其學殖之所醞釀，精氣之所結轡，千載之下，倒見側出，恍惚於語言竹帛之間。易曰「言有物」，又曰「修詞立其誠」，記曰「不誠無物」，皆謂此物也。今之人耳傭目僂，降而剽賊；如弇州四部之書充棟，字而汗牛馬，即而眎之枵然無所有，則謂之無物而已矣。（初學集三十一）

學殖之所醞釀，即是眞學問的表現；精氣之所結轡，即是眞性靈的表現。言之有物，指眞學問；修詞立其誠，指眞性靈。這如車之兩輪，鳥之雙翼，在牧齋看來，是不能偏廢的。但是在以前，震川荊川主於古而較重在學，公安一派主於今而較重在性靈，都不能像牧齋這般雙管齊下。

因爲重在學問，所以對「公安派」也不免有微詞。其袁祈年字田祖說謂：

雖然，豈惟田有祖哉，文亦有之。三百篇，詩之祖也；屈子，繼別之宗也；漢魏三唐以迨宋元諸家，繼禰之小宗也。

六經文之祖也。左氏司馬氏，繼別之宗也；韓柳歐陽蘇氏以追勝國諸家。繼禰之小宗也。古之人所以馳騁於文章，枝分流別，殊途而同歸者，亦曰，各本其祖而已矣。今之爲文者，有兩人焉。其一人曰，必秦必漢，必唐，舍是無祖也，是以人之祖禰，而祭於己之寢也。其一人曰，何必秦，何必漢，與唐，自我作古，是披髮而祭於野也。此二人者，其持論不同，皆可謂不識其祖者也。（初學集二十六）

此文是對「公安派」袁小修的兒子說的，文中便有箴規「公安派」的意思。

因爲重在性靈，所以對於規模震川者，也有些不滿意。他在震川集敘中曾這樣說過。

輕材小生，諛聞目學，易其文從字順，妄謂可以幾及家龍門而戶昌黎，則先生之志益荒矣。先生常序沔人陳文燭之文，諷其好學史記，知美贖而不知贖之所以美。學先生之學者，無爲沔人之知美贖則幾矣。（有學集十六）

凡是犧牲個性以模仿人家，而所模擬者又僅屬形貌方面，則總是牧齋所不滿意的。牧齋瑞芝山房初集序本蘇東坡「不能不爲」之說而引申之云：『古之人其胸中無所不有，天地之高下，古今之往來，政治之污隆，道術之醇駁，苞羅旁魄，如數一二，及其境會相感，情僞相逼，鬱陶駘蕩，無意於文而文生焉，此所謂不能不爲者也。』（初學集十三）這樣闡說東坡之語，便可知學問必須貯之於平時，興會乃是觸發於一旦。有學問而無興會，即無性靈；有興會而胸中無所有，即無學問。這是他所謂「萌折於靈心，蟄啓於世運，而茁長於學問。」（見有學集四十九，題杜蒼）

略自評詩文

第二節 顧炎武與黃宗羲

第一目 時代的刺激

顧炎武，初名絳，字寧人，號亭林，崑山人。明魯王時官兵部職方郎中，入清不仕，所著有日知錄，救文格論，亭林詩文集等事，見清史稿四百八十七卷。黃宗羲，字太冲，號梨洲，餘姚人，明魯王時官左僉都御史，入清不仕，所著有南雷文案、文定等書，事見清史稿四百八十六卷。

亭林與梨洲都是清代學術的開山祖師，而同時又是清初的遺老，不能無家國興亡之感，所以所受時代的刺激爲特深。因此，他們的文學批評，應從兩方面注意：一是學者的見解，一是時代的反應。由前者言，猶與清代一般學者之論文主張，沒有什麼分別，因爲清代學術在任何方面都受清初顧黃二氏的影響，文學批評當然也不能例外。由後者言，則爲顧黃二氏所特具，我們應特別注意，也應特加表彰。

正因他們是學者，所以都不重空文，不尚雕蟲篆刻。顧亭林日知錄中自言不欲爲文人，甚至以失足墜井比喻自刻文集，以投井下石比喻爲人作文集之序（見文集四，與人書二十）可謂對於文學抱着極端輕視的態度。黃梨洲也說：『且人非流俗之人而後其文非流俗之文。使廬舍血肉之氣充滿胸中，徒以句字擬其形容，紙墨有靈，不受汝欺也。』（南雷文案外卷，錢屺軒七十壽序）他們都看到明代文人空疎不學，而僅僅以文爲事，於是模擬剽

竊以貌似爲學，於是竊語狂吠以批尾爲學，於是黃茅白葦以雷同爲學，於是高自標致分門別戶，以標榜爲學，以罵詈爲學。愈重在詞章之學，愈不能成爲天下之至文。所以他們都以徒事空文爲可恥。這是他們文論的出發點之一。

可是，何以他們對於空文要這般深惡痛疾呢？那恐怕是受時代的影響了。他們所處的時代，是獸蹄鳥跡交於中國的時代；他們所處的時代，是上國衣冠淪於夷狄的時代。日月無光，山河變色，不能無家國淪亡之痛，而同時又無起神州陸沈之力，不欲托之空言而同時又不能不托之空言，不能不托之空言而同時又不願徒托於空言。在這樣情形之下，所以一方面承認文學的價值，而一方面又深恨空文之無用。他們所受時代的刺激，實在是太深了，太不能忍受了。那麼，呼天，呼父母，發之於心，自然形之於言，自然著之於聲，到那時，言隨心碎，聲與淚俱，字裏行間莫非真情之流露。當然，他們的文學批評，不會僅取消遣的態度。這也是他們文論的出發點之一。

在此二種情形交織之下，所以一方面重在文章的真精神，一方面重在文章的真作用。

日知錄卷十九，文須有益於天下條，最可以看出顧亭林功利的文學觀了。他說：

文之不可絕於天地間者，曰明道也，紀政事也，察民隱也，樂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於天下，有益於將來，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亂神之事，無稽之言，勦襲之說，諛佞之文，若此者有損於己，無益於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損矣。

其與人書中亦屢屢說明此旨。如云：「君子之爲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詩文而已，所謂雕蟲篆刻亦何益哉！」

（與人書二十五）上文所謂紀政事，察民隱，樂道人之善云云，概括說來，「救世」二字亦足以盡之。因此，他所作的不是雕蟲篆刻之文，而是『有王者起，將以見諸行事，以躋斯世於治古之隆』的著述。（同上）其與人書三云：

孔子之刪述六經，即伊尹太公救民於水火之心，而今之注蟲魚命草木者，皆不足以語此也。故曰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夫春秋之作，言焉而已，而謂之行事者，天下後世用以治人之書，將欲謂之空言而不可也。

（亭林文集四）

這是受了時代刺激，所以欲以所學所懷之足以救世者，載之空言。這種具經綸有作用者，雖是空言，『將欲謂之空言而不可也』。所以他再說：『故凡文之不關於六經之指，當世之務者，一切不爲。』（同上）所以他再說：『救民以事，此達而在上者之責也；救民以言，此亦窮而在下位者之責也。』（日知錄十九，直言條）我所謂『不能不托之空言，而同時又不願徒托諸空言』者爲此。

這就是就發表思想的文而言。至於抒寫性情，又當別論；雖不必有這般直接的作用，卻不能無令人感動的間接的作用。黃梨洲之論文，又重在這方面。

錢牧齋之論文，頗重在真性情，其自爲文，當然也自以爲是真性情之流露了，然在梨洲看來，則是『所得在排比鋪張之間，卻是不能入情。』艾千子之論文，也頗攻擊模擬之非了，然在梨洲看來，也是『只與模擬王李者爭一頭面。』（均見南雷文約一，魯菴庵墓誌銘）何以他們之文在梨洲看來，只見其僞不見其真呢？這有二因：（一）真

性情也須從自己體會有得之道理得來否則『啁啾 王李 變韓歐，一樣空疏各把筆』（南雷文定前集一，喜萬貞）『一至自南潯以近文求正詩』強異一十於二五，亦彼此皆譏而已。艾千子之文，其病即坐此。（二）反過來說，『情不至則亦理之郛廓』（論文管見）真能體會到理的，也一定有真實性情。他說：『廬陵之誌交友無不鳴咽，子厚之言身世莫不悽愴，郝陵川之處眞州，戴剡源之入故都，其言皆能惻惻動人，古今自有一種文章不可磨滅，真是「天若有情天亦老」者。而世不乏堂堂之陣，正正之旗，皆以大文目之，顧其中無可以移人之情者，所謂剗然無物者也。』（論文管見）錢牧齋之文其病又坐此。

因此，他得到這樣的結論——『凡情之至者，其文未有不至者也。』（南雷文約四，明文案序上）惟有一片至情，可歌可泣，纔能發爲至文，動天地而感鬼神。梨洲文案卷三 張節母葉孺人墓誌銘中有云：『予讀震川文之爲女婦者，一往深情，每以一二細事見之，使人欲涕。蓋古今來事無鉅細，唯此可歌可泣之精神，長留天壤。』因知牧齋文雖誦法震川，而終嫌不能入情者，即在缺少此一段可歌可泣之精神而已。此種精神，假使遇到忠臣義士，爲風雨之鷄聲，則尤爲梨洲之所表彰。其縮齋文集序云：

澤望之文，可以棄之，使其不顯於天下，終不可滅之，使其不留於天地。其文蓋天地之陽氣也。陽氣在下，重陰錮之，則擊而爲雷；陰氣在下，重陽包之，則搏而爲風。商之亡也，採微之歌，非陽氣乎？然武王之世，陽明之世也；以陽遇陽，則不能爲雷。宋之亡也，謝皋羽方詔卿龔聖予之文，陽氣也；其時遁於黃鐘之管，微不能吹，續轉鷄

羽，未百年而發爲迅雷。元之亡也，有席帽九靈之文，陰氣也，包以開國之重陽，蓬蓬然起於大隧，風落山爲蟲，未幾而散矣。今澤望之文亦陽氣也，然視葭灰，不啻千鈞之壓也。鋼而不出，豈若劉蛻之文家，腐爲墟壤，蒸爲芝菌，文人之文而已乎！

這是大漢天聲，這是天地正氣，『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民族精神賴以喚醒。這雖是空言，亦正所謂『將欲謂之空言而不可也』。

顧亭林也有這種意思。日知錄卷十九文辭欺人條云：『古來以文辭欺人者，莫若謝靈運，次則王維……今有顛沛之餘，投身異姓，至擯斥不容而後發爲忠憤之論，與夫名汗僞籍而自託乃心，比於康樂右丞之輩，吾見其愈下矣。』此則直是指斥錢牧齋一流人了。他再說：『黍離之大夫，始而搖搖，中而如噎，既而如醉，無可奈何而付之蒼天者，眞也。汨羅之忠臣，言之重，辭之複，心煩意亂而其詞不能以次者，眞也。栗里之徵士，淡然若忘於世，而感憤之懷，有時不能自止，而微見其情者，眞也。其汲汲於自表暴而言者，僞也。』文之至由於情之至，而情之至又由於情之眞，所以必須有眞性情，才能有動人的眞作用。黃梨洲鄭禹梅刻稿序云：『自有宇宙以來，無事無不可假，惟文爲學力才稟所成，筆纔點牘，則底裏上露。』亭林所說，也卽同此意思。

第二目 三位一體之文學觀

其論文之足以見其學者見解者，則爲義理考據詞章三位一體的文學觀。這是清代一般文人學者共同的主